

求是 丛书

# 话语规则与 知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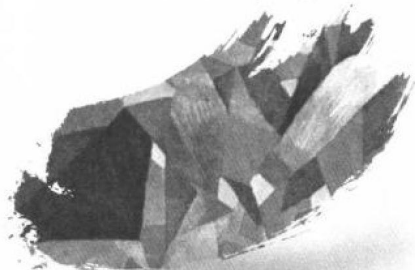
—— 语用学维度



盛晓明 / 著

学林出版社

求是 丛书



话语规则与  
知识基础  
——语用学维度

盛晓明 / 著

学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盛晓明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11

(求是丛书)

ISBN 7-80616-922-9

I. 话... II. 盛... III. 语用学 IV. H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3659 号

## 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



作 者——盛晓明

特约编辑——邱 红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125

字 数——20.4 万

版 次——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书 号——ISBN 7-80616-922 9/D·68

定 价——15.00 元

## 前 言

多年来,我一直热心于康德哲学的研究。按理说,这部著作应该清理一下多年积累的材料与成果,可是写下来的却是一本有关语言学的书。一件偶然的事打乱了我的计划,原本我希望去德国进修,不料包氏基金会却指定我去日本。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我不想放弃这次机会,但是赴日去研究康德问题又觉得十分滑稽。匆忙中我选择了东京大学的现象学家广松涉先生。广松先生虽说是昭和时代的思想大家,著作等身,却没有一点架子。他耐心地劝导我学习日语,并协助安排我的赴日事宜。遗憾的是,没等我成行,先生便去世了。等我到了东大,已经没人管我。虽说自由自在,可以作任何可能的选择,但无形中却又有一种惶惶然失其所的感觉。好在结识了一些日本、韩国和北欧的学者,一有机会便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德语和半生不熟的日语交谈起哈贝马斯和阿佩尔。我觉得康德的知识论问题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与当代语言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况且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直到第二年快结束时,我才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国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想法写出来。我认为,基

于先验性与语用学问题交汇点上的构造,必定能构筑起一个新的平台。它将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知识的基础,这种基础将既有别于相对主义,同时也能与传统的先验主义划清界线。

可是回国后的两年中,为公务忙碌了好大一阵子,只是抽空零星地发表了几篇文章。直到去年才得暇匆忙写完此书。写完后曾与应奇兄和自己的研究生们讨论过,他们指出了书中的不少纰漏,并认为行文也过于晦涩。纰漏之处容易修正,后一方面的缺陷一下子难以矫正,只能望读者谅解了。本书第四、第五和第六章中的部分内容已在“康德的先验演绎与自相关问题——评布伯纳与罗蒂的争论”(《哲学研究》,1998年第6期),“哈贝马斯的重构理论及其方法”(《哲学研究》,1999年第10期),“先验语用学与基础论辩”(《自然辩证法通讯》,近期刊出)等论文中有所涉及,系统的表述请参照上述论文阅读。至于第二、三两章中关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和奥斯汀、塞尔的言语行为论的论述,大体上只是一种铺垫。当然,这样的铺垫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后期维特根斯坦和言语行为论为当今哲学的走向构筑了一种新的平台。我之所以称之为是“当代思维的基本平台”,是因为,首先,无论是相对主义者与客观主义者均能在这之上进行各自的操作,同时也能基于自己的理由来作出辩护。其次,当今几乎所有的文化热点问题,包括一体化与多元主义、局域性与普遍有效性的科学、知识与权力、技术官僚的统治与无政府主义等问题都能在这一新的言语交往的平台上汇集,并能得到妥贴的讨论与处理。另外,各个学科,包括哲学认识论、语言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甚至法学和历史学的边界正在消失。至少,它们各自的问题和方法再也无法恪守门户,可以说,一个

问题即所有问题。

不过,本书没有,也不可能涉及所有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言语行为的自返性上了。因为在我看来,这一个问题包含了几乎所有的问题。在黑格尔的思辨中,这是一个“反思性”问题;在语言逻辑中,这是一个自相关性(self-reference, 自涉)问题。大凡从事知识的奠基,为了避免无穷倒退,最终都要涉及到自相关性。康德曾经告诫说,在考察科学的对象之前,要先考察一下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然而在“先验演绎”中,他的做法恰恰是把对自身认识能力的考察放到实际的经验活动中进行。从斯特劳森到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他们在奠基时也恪守了这一自相关性的诫律。对交往能力(交往主体)的考察总是在实际的交往过程中进行的。同样,我们每个人都介入了文化的互动过程之中,在遵守规则的同时也反思、批判并改变着文化的进程。

当代分析哲学家纽拉特曾讲过一个水手的故事。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漏水了,水手该怎么办呢?他不能让船停下来,重新组装这艘船,再说海上也没有再供停泊的港湾和可供检修的船坞。他只能在航行中修补漏洞。首先他得找一个安全的落脚点。可是当他刚补好一处时,脚底下又出现了更大的裂纹。我们便生活在这样一艘由语言与文化制度构成的船只中。作为“水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交往规范与文化制度承担了责任,但是又不能一出问题就试图拆了重组,而只能修修补补地维系着它的进化。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本书把知识的奠基问题置于言语行为和语言游戏的平台上进行,正是考虑到了言语行为所有的自返性与自身参照的特征。

当今,人们都已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科学知识是可循

的。可错论的观点打消了人们对科学知识作“终极奠基”的念头。但是承认科学知识是可错的,不等于否定它也在存在着“真”;否定“终极奠基”也不等于说科学知识就不再需要奠基,或者如费耶尔阿本德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怎么都可以”。尽管真理性和客观性的概念已为有效性的概念所取代,但是有效性问题依然有赖于说服与劝导,是一个与辩护有关的问题。如何为知识的有效性进行奠基或作出辩护,这正是贯穿本书的主题。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主题,一方面由于本人对先验性问题的偏好,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文化的责任感所使然。因为作为“水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共同所乘之船肩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读者都要同意我的观点,只要仔细读完本书,读者终将体会到这样的意思:即科学作为文化,不是少数精英们的事,而是我们都共同参与其中的“游戏”。这场“游戏”没有旁观者,无论是成是败都与我们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

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得到了香港金氏人文基金会的资助,特此向金乐琦兄弟表示感谢。另外倪为国兄在编辑此书时也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帮助,一并表示谢意。

2000 年于浙大求是村

# 目 录

|                  |    |
|------------------|----|
| 序 言              | 1  |
| 第一章 关于“语用学转向”    | 1  |
| 一 指号学的语用学维度      | 4  |
| 二 知识共同体          | 11 |
| 三 以谈论为平台         | 22 |
| 四 哲学语用学          | 30 |
| 第二章 “语言游戏”的语用学构想 | 40 |
| 一 “意义就是用法”       | 42 |
| 二 规则的课题(一)       | 50 |
| 三 规则的课题(二)       | 56 |
| 四 描述的自相关性        | 67 |
| 五 “生活形式”与基础论辩    | 76 |

|                             |     |
|-----------------------------|-----|
| <b>第三章 言语行为理论</b> .....     | 86  |
| 一 奥斯汀的“语用力量”理论 .....        | 88  |
| 二 塞尔的“可表达性原则” .....         | 97  |
| 三 意向性 .....                 | 108 |
| <b>第四章 普遍语用学方案</b> .....    | 117 |
| 一 “公共性”还是“主体间性”? .....      | 120 |
| 二 重构理解的任务 .....             | 127 |
| 三 双重结构原理 .....              | 139 |
| 四 普遍化的方案 .....              | 146 |
| 五 从谈论到“元谈论” .....           | 152 |
| 六 理想的交往共同体 .....            | 163 |
| <b>第五章 先验语用学的奠基策略</b> ..... | 177 |
| 一 “主体”的转换 .....             | 179 |
| 二 先验的“语言游戏” .....           | 192 |
| 三 “apriori”的歧义性 .....       | 203 |
| 四 论辩共同体 .....               | 218 |
| 五 “别无选择性”原则 .....           | 228 |
| <b>第六章 科学要求奠基吗?</b> .....   | 243 |
| 一 罗蒂:“先验论辩”有效吗? .....       | 244 |
| 二 阿佩尔与罗蒂:“奠基”还是“协同”? .....  | 251 |
| 三 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科学的语用学 .....     | 260 |
| <b>主要参考文献</b> .....         | 268 |

## 第一章 关于“语用学转向”

西方哲学近三十多年来的演变表明,开始于本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现今我们已经习惯于把所有的形而上学问题,知识论和科学论的问题,伦理、政治学乃至法学的基础问题均置于语言学的平台上来讨论。有人说这是语言学对哲学的“消解”,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语言学对哲学的改造。经改造后的哲学分析既无须像以往的自然哲学那样直接面对形形色色的存在物,也不必像康德、胡塞尔那样把自己的分析囿于纯粹意识的领域。由于语言是作为对象世界与纯粹意识的媒介展示给我们的,以语言为平台的分析只消面对在语言和符号中所存在的对象——语义学的出现使这种分析成为可能;同时语言分析也具有纯粹意识分析所具有优点,因为通过句法理论,我们不仅也能揭示意识的内在结构,并且用更现实的手段展现在我们面前。与传统哲学相比,语言的分析无疑更贴近日常生活,语言学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和无穷可能的思维空间为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哲学中提问的方式改变了,随之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得到相应的改变。总之,语

言分析使哲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有了更直接的形式。

哈贝马斯 1965 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就职演说中对这一不可逆转的“语言学转向”作出如下的确认：“使我们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按其本质能够认识的唯一事实：语言。随着语言结构[的形成]，我们进入了独立判断。随着第一个语句[的形成]，一种普遍的和非强制的共识的意向明确地说了出来。独立判断是我们在哲学传统的意义上能掌握的唯一理念。”<sup>①</sup>哈贝马斯的演讲反应了当时德国哲学界的观念转向。在 60 年代之后，“语言学转向”已不仅仅是英美分析哲学圈内谈论的话题，它也在悄悄地改变着欧洲大陆的哲学传统。当然我们很难想象，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的思想家们会纷纷投入到逻辑实证主义的门下，因为此时，经过波普、奎因和戴维森等人持续不断地自我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已经走上了绝路。“语言学转向”之所以在 60 年代之后可以持续，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完全是出于另外的契机，即言语行为论的兴起。

通常一谈到“语言学转向”，就会把它理解为具有明确指向的、一以贯之的哲学变革。其实，这一“转向”是由两条以上的线索交织而成的。一条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方向；另一条线索则是从日常语言学派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以言语行为论的提出为契机发展而成的语用学方向。更为奇特的是，这两条线索某种程度上说都源自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本人对自己前期《逻辑哲学论》中的逻辑原子主义的观点作了彻底的清算，为语言哲学开辟了一个

<sup>①</sup>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in：《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32—133 页。

新的方向。在五十年代,无论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还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论均受到主流哲学的质疑。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语用学不像是一种哲学,甚至也不配称之为“理论”,因为它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不具有一整套严谨的逻辑技术。维氏甚至承认:自己无意于提出任何形式的理论,或把自己的考察刻意地装扮成是“科学的”<sup>①</sup>。正因为如此,第二条线索无疑具有很大的含混性,甚至很难对之划定出明确的概念框架和理论边界。我们用莫里斯提出的“语用学”概念来指称它,也只是权宜之计罢了。至今为止,大多研究者都把语用学放在行为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加以考察,当然,这是一种误解。

语用学可以说是一种不愿成为“理论”的理论。表面上看,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法,然而却寓意着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在此之前,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尽管不能说一事无成,但却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实质是把我们的语言作为手段来使用,而不是把它看作是我们都参与其中的活动与生活形式。结果是非但没能摆脱形而上的幻相,反而使自己陷入语法的幻相,“使我们的理智入魔”<sup>②</sup>。语用学是逃脱语法魔力的一条途径,一种努力。因此我们有理由把第二条线索称为“语用学转向”。当初体现在“语言学转向”中的意图和要求,也许只有通过“语用学转向”才能真正有效地得以兑现。毋庸置疑,六十年代后,语用学正在悄悄地改变着哲学。不仅是语言哲学,也包括科学哲学、逻辑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价值哲学都需要在一个新的平台上重新构筑自己的基础。正如阿佩尔断言的那样,“现今的哲学无不带有语用

①② 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一部分,§109。

的 (pragma) 特征”<sup>①</sup>。

### 一、指号学的语用学维度

“语用学”的概念是从实用主义那里借用来的,不仅如此,它无论在概念、方法还是在立场上都与实用主义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Pragmatics(语用学)与 pragmatism(实用主义)在词源上都出自于 pragma,它既有“施行”的意思,也有“实效”的寓义。因此,把 Pragmatics 译为“言语施行论”或许更确切些。但是,由于莫里斯首次使用 Pragmatics 一词是与语形学(或句法学)和语义学相对应的,此时用“语用学”一词可能更合适些。在莫里斯那里,语用学不能被看成是一种独立的知识学科,而只是指号学中的一个特定的分析维度。在《指号、语言和行为》一书中,莫里斯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们不能把语用学理解为研究某种“语用指号”的学问。无论语用学、语形学还是语义学的对象都不是某种类型的指号,而是同一指号的三种不同的考察维度,都是指号学的组成部分。<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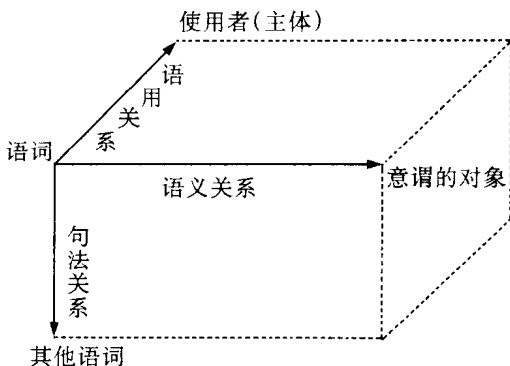
按莫里斯的说法,句法学(或语形学)维度涉及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维度有关于词语与其意谓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维度则体现了词语与其使用者(主体)之间的关系。指号学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可以按鲍亨斯基所提供的图式构成一个立体的三维图像:(见下图)<sup>③</sup>

---

① 阿佩尔:“为何先验语用学”, in: H. M. Baumgartner, Prinzip Freiheit, 1979, Freiburg, P13.

② 莫里斯:《指号、语言和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

③ 鲍亨斯基:《现代思维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从图中可看出,以指号学的词语符号为基准点,分别指向三种不同的对象(其他词语、意谓的对象和使用者),并分别构成了句法、语义和语用三种关系的维度。我们知道,逻辑实证主义者热衷于句法—语义维度的分析。他们首先致力于形式化语言的研究,把理想的句法结构分析看成是一切语言分析的典范。在此基础上向语义关系的扩展是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基本策略。当维特根斯坦说“逻辑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世界的图像”<sup>①</sup>时,“图像”的隐喻所力图构造的正是语义关系。按这一关系,任何命题或命题系统至少都在语义上表达某种事态。借助“图像”隐喻,逻辑学与知识论或科学论的内在一致性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另外,维也纳学派关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划分以不同于图像论的方式构成了句法—语义的分析。分析命题只涉及语法关系,这类语句是真的或假的,仅根据语言的规则便可知道,但综合命题则必须

<sup>①</sup>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6.13。

对应并表述某种经验事实。这两类命题构成了意义的界限。语句的意义要么被先天地构成,要么被经验地构成,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方式。

在莫里斯看来,逻辑实证主义的问题在于忽略了意义的第三种构成方式,即语用学的方式。道理很简单,如抽象掉语句的用法维度,仅凭句法——语义维度,我们所构成的意义只能是平面的,而不是立体的。当我们从上述抽象返还到语用学的具体时,同时也就把句法——语义维度包容于自身之中了。语用学不是对句法与语义的排斥,而是兼容。返回到语用学也就返回到了具体。尽管通过语义学就能了解意谓的方式,然而,如果不首先研究解释的行为也就无从谈论意谓。没有解释的行为就无所谓意谓。在指号学中,语用学的优位必须事先得以确认,否则谈不上语义研究。莫里斯的意思是说,尽管语形学与语义学也涉及到行为的某些方面,但只有语用学才涉及行为的整体。于是,语用学便可以定义如下:“语用学是从指号的解释者的全部行为中来研究指号的起源、应用与效果。”<sup>①</sup>

要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没有注意到语用学维度,那不是事实。卡尔纳普也曾明确表述过类似于莫里斯的划分方法:“我们可以把语言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如果在一个研究中明白地涉及到谈话者,或者换种更常见的说法,涉及到语言的使用者,那么我们就将之归入语用学领域。(不论这个研究是否谈及指谓关系,都不影响这一归类)。如果我们不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而只分析表达式和它们的指谓关系,我们就是在进行语

---

<sup>①</sup> 莫里斯:《指号、语言与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义学领域的分析。最后,如果我们也不考虑指谓关系,而只分析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在从事(逻辑的)语形学的工作。由上述三个部分组成的整个语言科学就叫指号学。”<sup>①</sup>尽管分类方法相似,但在涉及三者的关系上,他们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对卡尔纳普来说这三个领域中的任一领域都可以不依存于另一领域而独立成立。“如果我们分析一种语言,当然会涉及到表达式,但并不一定非要研究谈话者和指谓关系。虽然我们使用时始终会伴随这些因素,然而想要谈论这种语言,却完全可以不顾及另外一个,或两个因素。”<sup>②</sup>如果说语形学可以独立于语义学和语用学来构造,那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句法的逻辑结构并不直接依存于经验科学的实质的条件。但是,如果说语义学也可以独立于语用学来构造,那就成问题了。因为任何语句的意义要是离开特定的情景条件都将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更赞同莫里斯的看法。他认为,句法学还须以语义学为前提,而语义学恰恰又是从语用学中抽象出来的。因此只有语用学才构成全部指号学的真正的基础。自皮尔士以来,开始于美国实用主义的指号学理论,已经完成了一个转向,即把语言、知识和科学放到人类生活实践的语境中来考察,并把它们都看成是一个 *pragma* 的问题。

“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sup>③</sup>阿佩尔的这一说法中已经包含了对“语用学转向”的断

①② 卡尔纳普:《语义学导论》,Cambridge/Harvard, 1942, P9。

③ 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08 页。

定。这种“转向”已经不是什么趋向性的预测，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走向语用学，这是分析哲学经历半个世纪的曲折后的归宿。这意味着我们对语言的把握由思维的抽象走向交往中的具体；由偏面的分析走向新的综合。“正是语用学才分析整体作用；而在这个整体作用的语境中，对语言系统或科学系统句法—语义学分析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因此，唯有指号学语用学才能使当代语言分析的科学逻辑变得完整。”<sup>①</sup>

“语用学转向”直到六十年代才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首肯，由此演变成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哲学观念。追溯这一“转向”的过程，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变化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逻辑已经无力解决意义的经验标准问题。实证原则的演变显示，经验事实既不可能证实，甚至也不可能验证科学的命题。人们有理由说，也许实证原则赖以成立的前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奎因把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归结为“还原论”原则，即相信一切科学命题都必须还原为真的或假的直接经验命题。他认为，分析哲学要想摆脱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唯有抛弃或转换上述信条。这一转换同时也使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延续至今的“符合论”的真理观念发生动摇。约定论随之成了唯一可选择的理论基础。这时，即便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开始接受下述事实：只有在语言的用法维度中，意义的准则问题才有望得以解决。为此，他们就必须接受皮尔士关于意义澄清的语用原则，以及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的意义准则。即便在数学领域中，由哥德尔和丘奇的定理所引发的逻辑主义的危机和希尔伯特元数学的危机表明，

<sup>①</sup> 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